

##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之再评价

欧夏

(深圳市社科院 广东 深圳 518043)

**[摘要]**《江南逢李龟年》是杜甫的一首七言绝句。全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长期以来，虽说围绕该诗存在各种争议<sup>1</sup>，但有一点却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该诗是一首难得的七绝佳作。黄生《杜诗说》云：“即使龙标、供奉操笔，亦无以过。”《唐宋诗醇》曰：“此千秋绝调也。”杨伦《杜诗镜铨》引邵云：“子美七绝，此为压卷。”清人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言：“今观此诗，余味深长，神韵独绝，纵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刘禹锡之‘潮打空城’，群推绝唱者，不能过是。”今人莫砺锋称该诗“有余音袅袅，绕梁三日的韵味。”<sup>2</sup>对于以上共识，笔者不敢苟同。在笔者看来，《江南逢李龟年》有违人们对诗歌含蓄美和思想性的传统认知，需要重新评价。

**[关键词]**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之再评价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7.225

## 一、勉强的含蓄

《江南逢李龟年》之所以受到历代文人的一致推崇，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此诗含蓄蕴藉，意在言外，深得为诗之旨。黄生《杜诗说》云：“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曰：“四句浑浑说去，而世运之盛衰，年华之迟暮，两人之流落，俱在言表。”仇兆鳌《杜诗详注》言：“此诗抚今追昔，世境之离乱，人情之聚散，皆寓于其中。”《唐宋诗醇》云：“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矣。”当下有学者赞叹：“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sup>3</sup>

诗贵含蓄，但要做到真正的含蓄并不容易。含蓄最忌“过”，“蓄”得太深，含蓄就变成“含糊”了。刘勰《文心·隐秀》将含蓄表述为“隐”，在他看来，“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韞珠玉也。”意思是，“隐”即“文”除字面意之外的“另一层意思”（“重旨”），“隐”不能脱离“文”，就像爻象之各种象征义不能脱离爻象，珠玉无论如何离不开川渎一样。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简单明了地概括为八个字：“言外之意，必由言得”。“言外之意”就是读者以“言”本身为出发点和基础，在“言”的诱发和引导下，经过自然、合理的联想生成的。离“言”太远，兜很多弯子得来的“意”，便不再是“言外之意”。姜白石《诗说》云：“至如词尽意不尽者，非遗意也，词中已仿佛可见矣。”就是说，“词尽意不尽”中的“意”并不是深埋词面之下有待发掘的遗物，而是从词面就能看见端倪并领会得出的东西。司马光《迂叟诗话》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思而得之”四个字意思很清楚，就是说所谓“言外之意”，读者只要对“言”本身进行一番思考便能体会得到，一般而言不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更不需要像专家那样做深入研究。反过来说，如果某个“言外之意”是经过查阅大量资料或深入研究得来的，它便不再是“言外之意”。

真正以“含蓄”见称的诗歌一般都不是晦涩难懂的，因为它的“言外之意”都是由“言”而来，而“言”所给的提示和指引的方向都比较明晰。比方说李白的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的后两句，是公认的“含蓄隽永”，几个名词的罗列、几幅图片的切换，诗人的依依不舍之情便跃然纸上。诗人是如何做到的？是通过“言”的妙用做到的。“孤帆”变为“远影”，然后消失于“碧空”，只剩水波荡漾于“天际”，这是一个由近及远、由清晰到模糊再到消失的有序过程。诗歌语言本身提示我们：伴随着舟移景换，诗人一直矗立在岸边；景的延伸就是情的延伸，舟移景换的距离越长，诗人矗立的时间就越长，诗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就越长。这些都是读者阅读此诗时可以顺其自然联想到的。再比方说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首句用“寥落”说明行宫已遭人冷落，外加一

“古”字表行宫饱经时代沧桑。次句写春到行宫，鲜花盛开，

但旁边已没有了花容月貌的年轻宫女与鲜花争芳斗艳。第三句紧承前句，点明当年的年轻宫女已变为白头老妇，使人年华盛衰之感油然而生。末句通过白头宫女的闲聊，将开元、天宝年间事尽数摊开在读者眼前。一个“闲”字突显这些宫女的空虚寂寞；“说玄宗”三字，看似浅淡，却信息量极大。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二说此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赞此诗“只四语，已抵一篇《长恨歌》矣。”后经学者考证，元稹的“行宫”即洛阳行宫上阳宫，白头宫女即白居易之“上阳白发人”。她们于天宝末被“潜配”于此，历四十余载，终成“白头宫女”。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显然可以加深我们对《行宫》一诗的理解，但我们对此诗的理解却又并非取决于这些背景知识，因为其中的诗意“词中已仿佛可见矣”，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思而得之”。

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行宫》等诗明显不同，《江南逢李龟年》的所谓“含蓄”兜的弯子太多、太大，来得不易，来得勉强。

从诗歌语言本身来说，《江南逢李龟年》只是向我们传递了一则京城二友重逢于江南的信息，别的什么也没说，字面背后也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思而得之”的深意。这一点就连杜甫的忠实拥趸也是承认的。莫砺锋说：“前两句回忆当初在长安城里与李龟年几度相见，后两句交代两人重逢的地点和节令，全诗到此戛然而止。李龟年何许人也？诗中一字未及。诗人与李龟年在江南重逢，心中有何感慨？诗中亦一字未及。”<sup>4</sup>宇文所安更是坦言：“假定按字面的意思来叙述它的内容，那就是：我在岐王和崔九那里经常看到你，听到你歌唱，现在，在晚春，我在江南又遇到你了。难道这也算诗？更不用说是为人交口称誉的诗了。”<sup>5</sup>由此可见，“言外之意，必由言得”这一美学原则，《江南逢李龟年》并不符合。

那前面所说的世事沧桑和年华盛衰之感从何而来？我们可以在学者们对此诗的解读中找到答案：岐王、崔九是开元时期颇具影响力的王公贵族，也是酷爱文艺的风雅之士，“岐王宅”和“崔九堂”是当时文士艺人的雅集之所。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而杜甫是声名鹊起的诗人，二人自是雅集的常客。开元时期的杜甫和李龟年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所以，诗的前两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包含了诗人对开元盛世的无限怀念和对自己青春年华的深情追忆。四十多年后，诗人与李龟年偶逢于江南，此时，二人均已进入暮年，四处飘零，而大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更是一片萧条。盛世难再，青春远逝，晚景凄凉，抚今追昔，安能不心生感慨！由此可见，要理解此诗的“含蓄”，必须同时掌握与此诗相关的一系列背景知识：岐王和崔九的生平事迹、与文士艺人的关系、与开元盛世的关系，诗人和李龟年在出入岐王宅和崔九堂时的年纪、生活状况，诗人与李龟年在江南重逢时的年纪、生活状况，等等。这些背景知识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缺一便无法“含蓄”。比方说，如果不知道岐王和崔九去世于开元中前期（公元726年），便无法将此诗与

“开元盛世”联系起来，也无法推算出诗人和李龟年在出入岐王宅和崔九堂时正值青春年少。而如果知道岐王和崔九是开元中人，也知道诗人和李龟年当时正值青春年少，却不知道诗人和李龟年江南重逢是在二人分手四十多年以后，抑或再进一步说，如果知道他们江南重逢是在分手四十多年以后，却不知道他们在江南四处流落、晚景凄凉的话，那么，所谓世事沧桑和年华盛衰之感便通通无从谈起。所有这些背景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的专家辛辛苦苦查询、考证、研究出来的。是我们的专家为这首诗铺设了一条通向“含蓄”的管道，成就了它的“含蓄”。可是，如果一首诗要靠大量专家勾沉索隐的配合才能“含蓄”，那还是真的“含蓄”吗？

作为读者，每个人都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质疑和抱怨：我只是想读一首二十八字七言绝句而已，凭什么我得知里面的岐王和崔九的生卒年月？凭什么我得洞察岐王和崔九身边的雅集与“开元盛世”的关系？凭什么我得厘清诗人和李龟年聚散之间相隔了多少年？凭什么我得掌握诗人和李龟年在江南的生活状况？说什么“悄然数语，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矣”，殊不知，等我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理解了诗的“含蓄”，那我所花的时间早已远超阅读一遍《琵琶行》矣。

总之，笔者以为，《江南逢李龟年》的“含蓄”是一种赖专家成全、强读者所难的“含蓄”，榘枒粗硬，不足为法。这本是显而易见之事，但后世学人为“诗圣”大名所惑，不仅拒不承认，还绞尽脑汁、穿凿附会地打圆场、唱赞歌，着实令人唏嘘。

## 二、恐怖的价值

不过，笔者对《江南逢李龟年》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其含蓄的勉强，而是这种含蓄的背后潜藏着的作者的价值。

岐王是什么人？以他为核心的雅集又是什么东西？

岐王李范，乃唐玄宗李隆基同父异母弟。睿宗共有六子，长子李成器，次子李成义，三子李隆基，四子李范，五子李业，六子李隆悌（早夭）。儿时，兄弟五人曾经一同被武则天幽闭宫中相依为命多年；长大后，在唐隆政变、先天政变等政治斗争中，兄弟五人也能做到戮力同心。用李隆基自己的话说，“远自童幼，泊乎长成，出则同游，学则同业，事均形影，无不相随”，足见兄弟感情之深。睿宗复位后，嫡长子李成器深明大义，坚决辞让太子位，并与李成义、李范和李业一起力举李隆基承太子位。李隆基做了太子，尤其是当上皇帝之后，对众兄弟颇怀亏欠和感恩之意，再加上担心亲人反目、血溅宫墙的悲剧重演，如何处理兄弟关系便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最终，李隆基决定创立一种全新的兄弟相处模式。措施有三：一是养起来。当然不是一般的养，而是富养甚至纵养。给四兄弟以大量的食邑和封赐，保障他们可以锦衣玉食。据《旧唐书》记载，开元之初，宁王实封5500户，岐王、薛王也封至5000户。而当时封王的皇子只封2000户，贵为公主的皇女只封500户，足见玄宗对四兄弟的偏爱。此外，玄宗还时常给四兄弟“赐金分帛，厚其欢赏。”二是多沟通。玄宗于兴庆宫周边给诸王赐宅，“邸第相望”，便于来往。常与诸王“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三是绝异心。玄宗会利用各种场合暗示或提醒诸王勿生异心。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他曾与诸王闲步于太液池边竹林，谓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离心离意，此竹宗本不相疏，人有怀贰心生离间之意，睹此可以为鉴。”玄宗还出台措施，“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玄宗之所以这样做，不全为自身皇位计，也有兄弟之间的朴素情感在。

于是，大唐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逍遥王爷。他们与皇帝是手足兄弟，感情甚笃。他们曾经热衷于政治，也曾经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最终受时事所迫主动选择放弃。他们政治地位极高，却也不再有更高的政治目标。同时，他们在物质上殊蒙照顾，几可随心所欲。虽然政治上已无所追求，但物质条件的优越导致他们转而寻求感官上的刺激和享受，猎异追新，穷奢极欲。《开元天宝遗事》描述诸王生活时，多用“务奢侈”“极于奢侈”“骄贵”“曼贵盛”之类语。书中所

列奢华生活的事例至少有15件与诸王有关，分别为：花上金铃、妖烛、烛奴、香肌暖手、妓围、相风旌、占风铎、灯婢、隔障歌、高丽赤鹰、北山黄鹞、嚼麝之谈、暖玉鞍、竹义、情感第一等。其中，香肌暖手、相风旌、占风铎、北山黄鹞、暖玉鞍等便是岐王李范的杰作。

岐王李范除生活奢靡外，还好附庸风雅，喜结交文人雅士。与刘庭琦、张谔、王维、崔颢、杜甫等诗人皆有唱和；与李龟年等艺人也有往来。此便是所谓“雅集”。其中诗歌多为肉麻谀颂之作，充满陈腐宫廷气息，委实乏善可陈。这一点从诗歌题目中便可轻易看出，如张谔《三日岐王宅》（为岐王新生儿“洗三”而作）、《满月》《岐王席上咏美人》，崔颢《岐王席观妓》，王维《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等。

岐王李范活跃的年代，正值开元中前期。而众所周知，当时的唐玄宗提倡并要求节俭，励精图治。他重用姚崇、宋璟为相，节约用度，体恤民力，发展生产，缔造了著名的“开元盛世”。而当时的诗歌早已“由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荒漠”。节俭、务实、奋进是当时的时代精神。自由、开拓、创新是当时的文学最强音。无论怎么看，岐王的奢靡生活和岐王宅里泛着腐臭味儿的雅集都与这种时代精神和文学最强音格格不入。杜甫在《江南逢李龟年》中，选取岐王及其身边的雅集作为“开元盛世”的代表性符号，真有些匪夷所思。

当然，诗中还提到一个人：崔九。不过，笔者认为，崔九在诗中其实是一个从属性符号，与岐王的分量并不对等。崔九虽说是皇帝宠臣，但史料记载不多，无论政治地位还是影响力，都与岐王有较大差距。杜甫将他与岐王并列，原因只有一个：他姓崔。尤其他所属的博陵崔氏，长期被视为天下第一姓氏，是高贵出身的象征。岐王是王公的代表；崔九则是贵族的代表。

杜甫不仅以岐王、崔九及其身边的雅集代表“开元盛世”，而且以之代表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清人王文濡《唐诗评注读本》曰：“上两句极言其宠遇之隆，下两句陡然一转，以见盛衰不同，伤龟年亦所以自伤也。”从前之辉煌，如今之落寞，两相映衬，《江南逢李龟年》之所以倍受推崇，原因也正在于此。

可问题的关键是，经常出入岐王宅和崔九堂就真的那么值得炫耀？流落民间就真的那么令人不堪？实际上，王公贵族身边的雅集并不是每一个文人都喜欢的，有独立人格和平等意识的文人往往对之持抗拒态度。即便那些以攀附权贵出名的诗人，在回忆和反思自己的过去时，也很少以此为此傲、公开炫耀的。李白为避宫廷雅集，宁愿醉眠街头；就连王维后期也流露出对这种雅集的厌倦之意。对真正的文人而言，民间才是他们灵感产生的源泉，也是他们的精神故乡。他们在民间体会到的不是失落，而是快意。箪食瓢饮、陋巷简居的颜回，晚食当肉、安步当车的颜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就是这样的文人。而杜甫将这种王公贵族身边的低级趣味的“雅集”与自己人生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联系起来，直至暮年仍反复地追思、回味、伤感，充分暴露了其根深蒂固的等级思想、门阀观念和依附人格。

## 参考文献

[1] 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作者是谁、岐王是谁、雅集是在长安还是洛阳、“落花”有何寓意等问题上。

[2] 莫砺锋《余音绕梁的〈江南逢李龟年〉》，《文史知识》2011年第6期。

[3] 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11月第654页。

[4] 莫砺锋《余音绕梁的〈江南逢李龟年〉》，《文史知识》2011年第6期。

[5] 宇文所安《一个美国人看杜甫》，《大科技》2007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欧夏，出生于1967年9月，男，汉族，广东深圳，研究生学历，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及唐宋文学。